

青年学术丛书·历史

YOUTH ACADEMIC SERIES-HISTORY



近代青海民间商贸与 社会经济扩展研究

勉卫忠 著



人民出版社

近代青海民间商贸与 社会经济扩展研究

勉卫忠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青海民间商贸与社会经济扩展研究/勉卫忠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青年学术丛书)

ISBN 978-7-01-010820-9

I. ①近… II. ①勉… III. ①商业史—研究—青海—近代 IV.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3491 号

近代青海民间商贸与社会经济扩展研究

JINDAI QINGHAI MINJIAN SHANGMAO YU SHEHUI JINGJI KUOZHAN YANJIU

勉卫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06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0820-9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近代中后期民间商贸发展的历史基础与嬗变动因	(14)
第一节 近代青海民间商贸发展的历史基础	(14)
——清中前期青海河湟民间商贸的兴起和繁荣	
一、新兴商贸城镇的崛起及市场发育	(14)
二、商人队伍的扩大	(18)
三、商品种类和交易额的增加	(22)
第二节 近代青海民间商贸嬗变的动因及条件	(26)
——皮毛贸易为本地区商贸发展的主“引擎”	
第二章 各级城镇民间商贸的变迁及其市场发展	(37)
第一节 西宁——区域中心城市市场逐渐形成及其城市变迁	(37)
一、商业的繁荣	(38)
二、市井文化的产生	(53)
三、新因素进入市井	(58)
第二节 中心市镇崛起及其市场发展	(63)
一、寺院城镇兴起及其市场发展	(63)
二、军事城堡功能的转型及市场的发展	(76)
三、县治所城镇的市场繁荣	(78)
第三节 集镇兴起及其市场发展	(81)
一、集镇数量的增加	(81)
二、集镇市场——集市的发展与繁荣	(86)
第三章 城镇商贸与农牧民社会经济的变迁	(100)
第一节 河湟城镇商贸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共生	(100)

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与融合	(101)
二、为农牧民经济的扩展提供生产技术、资金和信息	(108)
三、加速各民族生产与消费体系的开放	(120)
第二节 城镇商贸巩固发展了回族城镇聚居区	(127)
第三节 城镇商贸的辐射与牧民生活渐变	(143)
第四章 民间商贸网络的形成及其运行	(159)
第一节 以西宁为中心的城镇商贸网络体系的形成及特征	(159)
第二节 民间商贸的运行	(182)
第五章 民间商人及其农牧民家庭经济的扩展	(210)
第一节 商人的构成及其特征	(210)
一、洋行的侵入	(210)
二、省外商人及经营专长	(212)
三、本省商人的兴起及其经济实体	(214)
四、藏族商人与寺院商贸的变迁	(220)
五、回族商人的变迁	(223)
第二节 商人与青海农牧经济的扩展	(238)
一、商人与农牧业生产经营领域的扩大	(239)
二、商人与非农牧经济的成长	(265)
三、商人资本支配下的农牧民生产经营方式	(286)
结 语	(292)
主要参考文献	(299)
后 记	(306)

导 论

一、选题的意义

从民族关系看。青海地处我国西北、青藏高原东北,其东部的河湟地区是农牧镶嵌的过渡地带,其独特地理位置在西北和青藏高原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青海具有城市、农村、牧区、民族、宗教等独特的人文地理特征,境内有汉、回、藏、蒙、撒拉、土等世居民族。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各民族的关系整体过程的基调是趋向融洽与和谐的。尤其是近代以来,伴随着青海民间商贸的发展,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与互动充分加强,尤其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蒙、藏、土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撒拉、保安两大系统的群体在青海从未出现过全局性的民族关系紧张和严重的民族分裂事件。因此,学术界往往将其作为研究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稳定团结的样板而加以关注。然而青海境内的各民族有着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那么要探寻他们之间的和谐共生,就要探寻其间互动的动力、根源和基础——民间商贸,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互补共生模式保证了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民间商贸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在加强牧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促使藏区经济繁荣,消除某些政治上的离心力,则是其他事业无法取代的,因而从民间商贸与民族经济开发的角度探寻近代以来青海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与融合,对解读历史上乃至今天青海各民族间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与民族团结就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

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在当前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区域城市发展和区域经济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备受瞩目,相当部分国内城市史专家、学者在论述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问题时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主要靠工业的崛起,或走的是一条因商而兴,继而因工而盛的道路,强调工业化才是城市

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命脉所在。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青海时,发现青海城市在其步入近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起步时间比沿海地区差了半世纪之久,而且商业力量在当地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也远大于工业,并长期占据主角位置。自皮毛贸易兴盛以来,青海走上了因商而兴的道路,却未能像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那样随即走上因工而盛的道路,相反新式工业发展极为缓慢,商业经济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依旧居于高位。青海作为民族聚居大省,由于近代城市工业的落后,因而商业的发展对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近代青海城镇商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广大农牧业地区的经济开发。城乡商业贸易的开展为各民族农牧民产前生产生活资料的获得,产后产品的销售提供了稳定渠道,导致其生产消费体系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民间商贸的开展还推动了民族地区城镇市场兴起,为各民族利用农牧资源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其生产资金、技术、各种信息的获取奠定了基础。城镇商业的发展和商业网络体系的建构,所产生的巨大辐射聚集力,在农牧民族生产者与市场间构建起一座桥梁,使小生产者的产品变成流通的商品,逐步扩大了其生产的内容和范围,进而导致民族地区生产领域扩大、农牧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手工业生产种类、数量商品化进一步增长等。同时,伴随着商业的渗透,在各民族共同体内部产生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商业制度。在此基础上,他们原有封闭落后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出现了较为显著的职业分化。由此可见近代青海城镇商业发展与民族经济开发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近代青海农牧过渡地带的区域城市发展呈现出与东南沿海城市以及中部不同的轨迹模式,作为内陆民族地区的一个典型,通过对它的个案考察,有助于同时弄清该类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普遍问题,丰富近代中国不同类型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故而对青海农牧过渡区域城市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探讨,有利于通过历史与现状的有机联系,完整地揭示出青海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从而更好地为本地区乃至全国当前的各项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智力支持。

总而言之,如今新的世纪刚刚开始,在西部大开发契机下,国家又提出了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随着这项政策的启动,青海生态、资源、区位等在国家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当前青海正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把加大对周边省区各民族民间的经济往来合作与推进农牧区城镇化建

设,作为实现对外开放,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现生态立省,构筑高原生态安全的屏障,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提高农牧业综合发展能力,提高区域发展支撑能力,加快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一个重要环节。本书对民间商贸与民族经济发展主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前青海农牧区生态保护、经济开发及城镇化发展的决策思考,为实现藏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加快青海藏区和全省发展、增加各族人民的福祉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二、相关研究回顾及突破点

与本书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青海商贸研究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近代商贸研究两部分。青海商贸的研究是本书研究的基础,是本书回顾分述的重点。后者主要是借鉴方法和理论,不作论述。而鉴于青海商贸研究在视角、方法等上面的滞后,本书还要积累近代经济史研究涵盖的近代区域城市史、近代商业网络、边疆民族经济史三大方面的方法和理论,而且海内外学者已有若干专题研究陆续出版发表,这些研究在许多相关领域做了有益的探索,一些方法和见解值得借鉴。

本书认为与近代青海民间商贸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涵盖民族贸易和各专题研究两大方面,近几十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已有若干专题研究陆续出版发表,这些相关领域探索的方法和见解值得借鉴。

(一)民族贸易研究

历史上,青海由于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境内居住着以回族为主体民族的包括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在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以复合型经济为模式、以商业为特点的生产方式的穆斯林群体民族和以藏族为主体民族其中包括青海蒙古族在内的以典型的游牧生产方式为主的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群体。他们之间的经济状况、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都存在着较大差异,整个地区可划分为农耕区和游牧区两大类型,很难形成像内地一样的统一市场,各民族间只能通过商品交换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所以民族商贸在这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故而历代的统治者制定“茶马互市”以限定农牧民之间的商贸交往,清前期国力强盛,将整个青海蒙藏牧区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

遂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停止“茶马互市”,沿袭千年的官方专营的“茶马制度”的种种限制被取消,从此自由的民间贸易出现了,因此清代前期青海地区民间贸易就是历史上西北民族贸易的延伸与发展。近几十年来,关于民族贸易的成果颇丰,多数文章集中在回藏贸易上。

有关专论回藏贸易史的论文只有几篇,如高占福、喇海青《甘、青两省回藏贸易问题探讨——也谈开发青藏高原的途径问题》(《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3—4期)一文标志着回藏贸易史研究的开始,该文力求为现实经济服务,寻找回藏贸易的历史规律性。分析认为回藏贸易发生的客观原因是河湟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探讨了回藏贸易的历史渊源,为我们简述了回藏贸易的历史过程,并为进一步探索回藏贸易史打下了基础。张世海《民国时期安多地区的回藏贸易》(《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对民国时期安多地区回藏贸易的规模品种及贸易方式做了详尽介绍,并描述了这种贸易活动的繁荣趋势,为我们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基础。马平《近代甘青川康边藏区与内地贸易的回族中间商》(《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专题讨论了回藏贸易中回族商人问题,回顾了近代以来甘青川康边藏区的回藏贸易史,指出回族中间商的历史作用与功绩。勉卫忠《清前期河湟回藏贸易略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利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系统地梳理了清朝前期河湟回藏贸易史,探讨了新型回藏贸易的商业城镇,回藏贸易的商品、交易的方式、商道、运输工具及驮价,也指出了回藏贸易的历史地位及作用。另《清前期河湟回藏贸易的渊源及商人》(《青海回族十年文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一文对清前期河湟回藏贸易的历史渊源和商人的组成及商人的作用做了粗浅的论述。在《回藏贸易中的盐业问题》(《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明朝至民国时期在河湟回藏贸易中青盐逐渐成为河湟回族商人转口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到了民国时期这宗生意基本上掌握在青海回族商人手里,他们在河湟商品贸易中以雄厚的资金和善于经营的竞争能力,几乎垄断了青海青盐的收购和转口贸易。硕士论文《清末民初河湟回藏贸易变迁》对清末民初时期河湟回藏贸易的研究指出,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这种经济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迎来了它繁盛的黄金季节,原来的商业网络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随着回族商人移民的大量涌入藏区,清前期兴起的回藏贸易的新型商业城镇更加繁荣,西宁逐渐成为河湟最为重要的回族商贸中心和

回藏贸易的商品集散中心,更是青海东部的中心商业城市。这时又出现了新型的回藏贸易的寺院城镇、军事城堡及其集市,这些新的商业网络点的出现逐渐使回藏贸易延伸至更远更深的藏区,从而把整个藏区纳入到回藏贸易的网络之中。回族内部不仅出现了脱离农业而专门从事商业的商人阶层,而且其规模随着贸易的繁荣不断地扩大,回商中不仅有倾倒地方的官僚巨商和商业资本家,也有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整个民族都参与到了回藏贸易的黄金季节之中。回族商人在这些新的商业城镇及周边地区安家立业,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回族商业社区,回藏贸易巩固了回族商业社区,奠定了河湟回族的居住格局。

除以上专题论文外,在回族经济史、地方史以及族群研究中涉及的有关回藏贸易史的研究,较为重要的有十几篇。其中段继业《青藏高原地区藏族与穆斯林族群的互动关系》(《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指出了以回藏贸易为形式的回藏两族间的互动的深层次根源则是两种生产方式的互补共生需要。李德宽《西北回族“复合型经济”与宏观地缘构造的分析》(《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指出西北回族经济是一种“复合型经济”,探讨了回藏贸易产生的宏观地缘结构,说明以回藏贸易为主的商业对复合型经济结构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藏贸易促使西北城市商业网络的形成。刘晨光《青藏高原地区藏族与回族经济合作的深层次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一文简述了藏族与回族经济合作的历史与现状。妥进荣、张世海《论回藏关系》(《回族学论坛第一辑·回族学与21世纪中国》)一文简述了河湟回藏贸易的历史现状,寻找历史规律为回藏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马学贤的《青海传统民族贸易中的回族商贸经济的形成与发展》(《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一文论述了历代青海回族商人的经商情况,经商的地域范围,经营的形式、内容、方法以及经营品种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高占福、喇海青的《甘肃临夏和青海东部地区回族的商业贸易》(高占福《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一文从历史上寻求临夏和海东地区的商业贸易,简述了两地之间的回藏贸易的发展史。喇海青的《河湟回族经济史研究》(《青海回族》1995年年刊)一文对河湟回族经济的历史发展及其特殊形式和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论述。还有杨作山的《清末民初的青藏贸易及其历史地位》(《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回藏贸易史被正式提出及研究是在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西北考察之后开始的,之前虽没有过正式深入探讨,但由于回族贸易历史悠久,作用特殊,时时充满生机和活力,也很早被国人注意到,在汉文文献的正史、实录、地方志及私家著作中都能找到有关回藏贸易的零星记载,但遗憾的是大量的藏文文献中并无任何有关回藏贸易的历史记载。时至今日,回藏贸易已成为一个传统的选题,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和零散,只能让研究者扼腕叹息。

(二)各专题研究

皮毛贸易。清代晚期以来,随着中西贸易的不断深化和扩大,青海对外贸易的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中在古代多被弃之不用毛类(主要是羊毛和驼毛)成为青海输出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商品,而传统的输出商品,如皮类等商品被进一步大规模地开发出来,输出规模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这种变化一改青海无大宗商品出口的状况,变中转地为重要的原材料出口地。对青海社会经济的影响至为深远,远远超过了古代茶马贸易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清代晚期及民国时期西北民族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目前所见涉及对青海皮毛贸易研究的论文有:喇琼飞《民国时期回民皮毛生意》(《宁夏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美]詹姆斯·艾·米尔沃德《1880—1909年回族商人与中国边境地区的羊毛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樊如森《天津开埠后的皮毛运销系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吴松弟、樊如森《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渠占辉《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的羊毛出口贸易》(《南开学报》2004年第3期);胡铁球《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与社会变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专题研究只有一篇,即胡铁球《近代青海羊毛对外输出量考述》(《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本书根据地方志、实业统计、海关统计、征税局统计及学者有关青海羊毛输出量的记载,采取估计推算、互相核对方法,最后确定了近代青海各个时段羊毛输出的基本情况。但没有把皮毛贸易作为近代青海社会变迁史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研究,没有讨论皮毛贸易的地位以及引起的社会变迁。

商人研究。对商人的研究一直较薄弱,青海本地研究者极少涉及,省外研究者由于对青海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缺乏了解,再加上文献资料的缺乏和零散,只能间接涉及,都是就事论事,很难深入下去。目前对青海商人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青海特有的商人歇家上,国内专文研究歇家主要有王致中《歇家考》(《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马明忠、何佩龙《青海地区的歇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李刚、卫红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与青海歇家关系探微》(《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这三篇是前几年的研究成果,最近两篇为胡铁球、霍维洮《歇家概况》(《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上述两篇认为前三文基本上都把歇家概念定为青海地区一种特殊的“行店”或“商铺”,其中前两文认为歇家最早产生于清初,第三文认为青海歇家起源于明代,但没有征引史料说明,且认为歇家是山陕商人在青海地区独创的市场中介组织(行店),显然值得商榷。马安君《近代青海歇家与洋行关系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一文经初步探讨,指出歇家早在洋行进入之前就已活跃在青藏地区,洋行没有使歇家买办化,二者只是特定时空中的商业合作伙伴,歇家的衰落与洋行也无直接联系,青海地方官僚资本的商业垄断才是歇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不能因为歇家曾与洋行合作过就否定其在近代西北民族商贸中的重要地位。

宗教寺院商业。河湟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佛教寺院和清真寺遍布全省,由此,寺院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有李峰《明清时期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商品货币经济新成分的生产和发展》(《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李峰和李海英《近现代青海地区清真寺寺院商品货币经济形态浅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李建国《近代西北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浅探》(甘肃省历史学会编:《史学论丛》第10集,2003年版)等。

城镇商业。近代青海城镇一般都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人口集中,是多民族的物资集散地和商品流通枢纽。研究近代青海商贸史一定要与城镇的发展史结合起来。此类文章有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曲青山和阎东锋《论近代西宁商业的资本构成、经营形式和历史作用》(《社会科学参考》1991年第2期);马征《论清代“环海商都”——丹噶尔商贸之兴衰》(《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及勉卫忠《寺院城镇的兴起及其功能》(《柴达木开发研究》2008年第2期)。马安君

《民国时期青海城镇市场述论》(《西藏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指出民国时期青海的城镇市场在原有基础上有了一定发展,虽然许多地方仍不尽如人意,但还是对传统的军事和交通重镇模式有所突破,商贸业的顺利运营在城镇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文章以西宁、湟源、结古、鲁沙尔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市场的发育状况为例,指出它们各自的发展缘由与特点,并归纳出民国时期青海城镇市场的总体特征,以期对此领域有较为明晰的认识和科学的总结。

另外,关于青海商贸研究的综述有马安君《20年来近代青海商贸研究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一文较为详细地总结近代青海商贸研究20年来取得的成果。并对相关成就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研究中出现了内容不均衡、拓展性研究欠缺、视野不够开阔、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指出今后应注重史学理论与史料的紧密结合,运用多学科方法,多角度、多层次地去进行创新研究。涉及近代青海商贸的专著有10余部,均为青海经济史研究的大家之作,虽然侧重点不同,结论有差异,但史料翔实,论证有力,是后学者的必读之作。如翟松天《青海经济史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近代青海商贸业的发展、青海商业的阶段性和特点,指出:近代前期以传统民族贸易为主,20世纪前30年以私商从事的民间贸易为主,40年代则以官僚垄断资本为主。特点是畜产品在交易中占重要地位,广大牧业部分保留以货易货的贸易形式始终贯穿于三个阶段。其他相关专著还有崔永红《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昱和聪喆《青海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杨景福《青海商业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另外,在关于西北经济史涉及青海商贸的有谷包主编《西北通史》第四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青海经济部分。王致中、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的第7章和第8章,论述了近代甘、宁、青市场和青海歇家及丹噶尔城的商贸状况;《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1840—1949)》(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第13章,以近代河曲藏区贸易为例,对近代西北商业进行了类例研究。林永匡、王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第8章第2节,阐述了甘、宁、青地区的民族民间贸易,指出清统一西北后,此地的民族民间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一书的第5章,讨论了西北近代贸易事业的开发问题,对研究近代青海商贸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著作都对近代青海商贸问题有所涉及。

(三)突破点

综上所述,近年来青海商贸研究的相关内容已引起部分学者专家的关注,在一些论著中已有一定涉猎,其中有一些很值得借鉴的方法和见解。但由于受研究对象和范围所限,和本书直接相关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其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深入性还远远不够,许多研究仍停留在问题的表层或问题的某一层面上。这一方面是由于近代青海复杂的政治背景、经济构成和民族关系,再加上长期遗留的传统问题,导致学者们在有些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形成定论,在某些问题上由于种种限制,只能就事论事或泛泛而谈,在某些问题上还不够深入,甚至留下了空白。另一方面是由于有关青海历史文献的缺乏其资料仍然散见于各种论著、文献、及档案材料当中,还有待于收集、挖掘和整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研究者的精力,再加上学术界对近代城市史、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加之本书选题跨越城市史、经济史、民族史三个分支学科领域,客观上增加了研究难度,而这些研究领域无论在理论或研究体系上均处于探索阶段,可供参照借鉴的东西太少,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系数。这些都使得直接与本书研究有相关的研究内容迄今为止未能得到广泛的重视,还没有见到专门的相关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通过对上述国内外与本文相关研究主题的详细分析考察,以上的不足虽然是种缺憾,却为学者们提供了钻研的空间,这也正是我们要继续努力尝试解决的问题,本书预期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突破。其一,新史料。研究历史最主要就是史料占有及其突破,本书收集了过去前人没有注意到的青海地方特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使得研究能顺利开展,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深度。主要历史资料包括有本人长期以来在青海的各地社会历史调查所收集的口碑资料以及相当数量的稀有罕见的地方文献、档案史料,寻找了大部分民国时期有关青海的调查游记等资料。其二,新思路。本书以为现实经济服务为出发点,摒弃了长期以来因近代青海复杂的政治背景、经济构成和民族关系导致的研究视

角、方法方面的滞后,本书长期积累了近代经济史研究涵盖的近代区域城市史、近代商业史、边疆民族经济史三大方面方法和理论,本书拟借助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及近年来研究领域的崭新视角,以清朝、民国时期国家——地方社会变迁场域中的青海民间贸易兴起的社会因素为背景,以民间贸易和地方民族经济扩展的互动关系为主线,采取各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细致探讨以各级城镇市场为依托,由各族商人为主导的民间商贸的变迁过程和运行机制,从而揭示其对青海地方民族社会经济扩展的历史绩效,对我们深化对当前青海农牧区生态保护、经济开发及城镇化发展的决策思考,为实现藏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加快青海藏区和全省发展、增加各族人民的福祉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其三,新领域。目前区域城市史的研究着力点大多偏重于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对内陆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发展关注甚少,且当前仅有的少量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北部边疆地区,对于农牧过渡地带及牧区腹地的城镇发展关注更少。本书以近代青海民间商贸与民族经济扩展为主题,一方面从农牧区民族经济开发视角来研究区域城镇史;另一方面从区域城镇发展角度探讨农牧区民族经济史,两者的有机结合,衍生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实现了研究视点的新突破。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力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上述研究思路,重点对下述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其一,分析近代青海民间商贸兴起的历史基础与嬗变动因。放眼国际、国内时局变化,主要论述前近代青海河湟民间商贸的兴起和繁荣使原来彼此孤立的农牧经济区域开始有了一定的经济联系,为近代青海民间商贸兴起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的皮毛贸易刺激并带动了青海商业的发展,皮毛贸易带动了相关商业行业的发展,大量的皮毛外运,各族人民或生产、或转运、或销售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额外增加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省内外及国际市场上的生产和生活消费用品,致使青海的商业、金融运转正常,也使输入商品剧增、人民购买力旺盛,皮毛贸易是整个青海经济社会运转的中心力量。总之,前近代青海河湟民间商贸的兴起、繁荣和近代青海皮毛贸易的“引擎”等要素的合力推动了近代青海民间商贸形成与发展。

其二,各级城镇民间商贸的变迁及其市场发展。包括西宁——区域中心城市市场逐渐形成和中心市镇崛起及市场发展、集镇兴起及市场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繁荣的商业促使西宁市井文化的产生与丰富,并刺激了西宁向近代化方向转变与发展,近代新的社会因素也在西宁竞相驻足,西宁正从一个中小城市,向中等城市发展。尤其1929年青海建省后,西宁作为青海的首府,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地区区域性城市,这是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宁区域中心城市市场的形成对青海其他城镇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寺院城镇和军事城堡还有少数县治所在近代青海市镇市场体系的中级市场,中心市镇上连区域中心城市市场,下通基本集镇市场和农牧区集市,既是当地周边农牧区的商贸中心,对附近市场具有一定的支配力,同时又是一定范围内(一县或数县)的贸易中心和货物集散地。在商品流通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它的普遍兴起和发展对集镇网络的形成,乃至全省性统一城镇市场网络体系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近代以来由于各级集镇市场的蓬勃发展,对带动青海农牧区商品经济发展和促进青海城乡统一商品市场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逐渐在青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层次结构分明且组织严密的集镇网络。它们作为商品流通中的重要一环,上连大中城市,下通广大农牧区,由此在全省范围内与大中市镇共同构建起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城镇商业市场网络。

其三,城镇商贸与农牧民社会经济的变迁。主要论述了河湟地区城镇商贸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共生;城镇商贸巩固发展了回族城镇聚居区;城镇商贸的辐射与牧民生活渐变三个方面的内容。河湟地区城镇商贸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共生表现在城镇商贸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和社会融合,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共生,这一切为民族间经济交往与地区经济开发创造了条件。城镇商贸为农牧民经济的扩展提供了生产技术、资金和信息。近代集镇在河湟各民族地区人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信息流通量的扩增、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和交流的频繁,同时促使人们思想和社会变化的加快,无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民间商贸的触角已延伸至农牧民各民族各传统社区,涉及千家万户的汉、回、土、撒拉、藏、蒙等少数民族,使他们昔日高度封闭的生产——消费体系也就与社区外部的区域城市市场体系产生了联系,逐渐走向开放。城镇商贸巩固发展了回族城镇聚居区,近代城镇回族聚居区的分布,通常与商人

和商人资本的分布是成正比的。凡是商人和商人资本集中的地方,同样也是城镇回族聚居的地方。城镇回族聚居区的分布与社会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同时也成正比例关系。城镇商贸的辐射与牧民生活渐变,从牧民家庭消费中的生活资料消费的渐变反映出牧区对农耕区的产品依赖从单一向多样性的方向不断发展,也反映出其消费结构的变化在不断加大和深化。商贸的频繁往来直接催生了普通牧民的经商意识,牧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经商之术,而且分析了其资本的组成方式和经营模式。从牧民农业为生产方式的扩大和畜牧生产的结构调整两个方面论述了商贸对牧民生产结构的影响。

其四,民间商贸网络的形成及其运行。包括以西宁为中心的城镇商贸网络体系的形成和民间商贸运行两节的内容。第一节从区域的生产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商品集散中心和金融中心几个方面论证了青海河湟流域的西宁成为左右全局的全省性经济中心城市和以西宁为中心的城镇商贸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该网络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二节论述了民间商贸运行方式和交易方式,以输出皮毛、食盐、输入茶叶三种商品的流通为例,通过个案分析从理论与实践上清晰全面地揭示近代青海城镇商贸网络内部的运行机制。

其五,民间商人及农牧民家庭经济的扩展。首先以全新的视角划分了商人的构成及其特征。依据青海近代的人文特征,以省内外商人和民族划分更为合理,有省内外汉族商人、回族商人、藏族商人和寺院商业、洋行等,他们或为行商、坐商,或为批发商、零售商、小商小贩,或从事过载行业、大小行业商铺(店)、歇家等行业支撑着近代青海商贸的正常运转。其次论述了商人的商贸活动引起的农牧民家庭经济的扩展,具体体现在:1. 农牧民家庭农牧业经营领域的扩大,具体探讨了商人的商贸活动刺激了商业性农业和牧业的出现和发展;2. 农牧民非农牧经济的成长,包括农牧民家庭成员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和出门“搞副业”从事其他兼业两种形态;3. 商人资本支配下的农牧民生产经营方式。

在研究理论方法上,本书主要承继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除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外,进一步运用城市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力求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指导下,尝试借鉴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以上主题展开探讨,在围绕这一主题的系列研究中,以求在理论方法上有所突破的同时,做到言之有